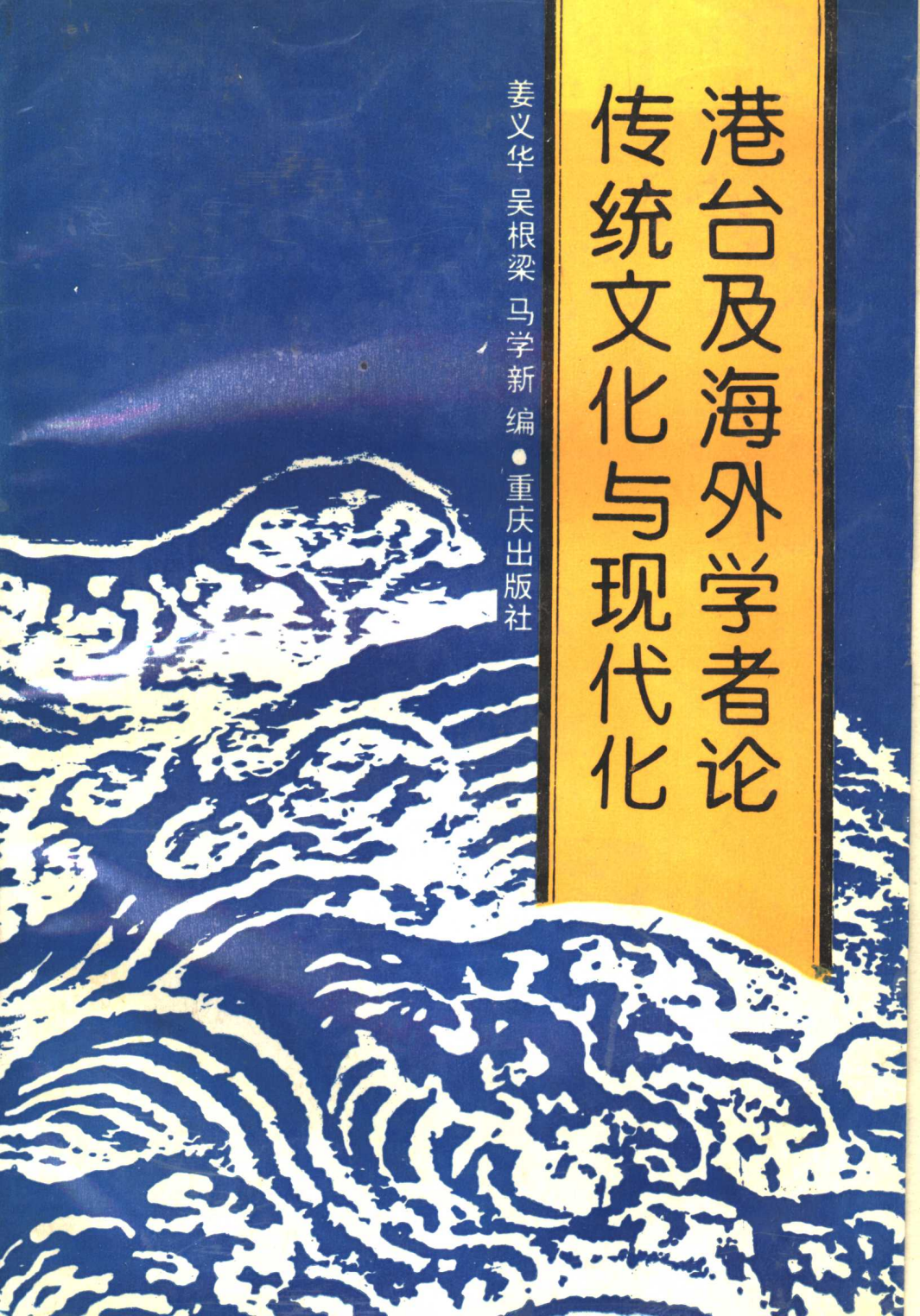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dramatic landscape with dark, craggy mountains in the upper half and turbulent, swirling waves in the lower half. The style is expressive, with bold brushstrokes and varying ink tones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港台及海外学者论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姜义华 吴根梁 马学新 编 ● 重庆出版社

姜义华 吴根梁 马学新 编 重庆出版社

港台与海外学者论

傳統文化与现代化

周谷城题



责任编辑 刘世龙

封面设计 晓 河

姜义华 吴根梁 马学新编

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5 插页2 字数488千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50

ISBN 7—5366—0707—5/C·21

定 价: 5.80 元

前 言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我国近几年兴起的中国文化总体性反思的热潮中一个突出的主题，引起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和其他各界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

在中国，确实是20世纪、19世纪、18世纪、17世纪、甚至还有不少更为古老的东西共生并存。从理论上分析清楚这种新与旧共生、古代与现代并存的情况所由以产生的原因，解决什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命运？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今日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建设。因此，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为讨论和研究的热点，反映了近几年开展的中国文化总体性的反思，已经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的必然需要。

底下，我们拟就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谈几点看法，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正面与负面——现代商品经济观念冲击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双重结果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在列强炮舰、鸦片、商品的联合攻击下，仓促地同自己漫长的古代告别，开始了近代化、现代化独特而艰难的历程。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岁月已经流逝而去。在中

国，形成了新的社会生产力、新的社会交往形式，在差不多同一时刻移植来了西方式的“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这一切，给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特殊形式、特殊道路及有限的水准，却又在同时保存了甚至强化了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中一些基本的东西，并且给它们以新的色彩、新的作用。历史变化中的这种矛盾的现象，既表现在思想家们理论化了的学说之中，更表现在亿万民众的日常思维、社会心理、世俗要求与普遍愿望中，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民性之中。

要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文化发端于人为使自己包括个体与群体在内更臻于完善所作的努力，发端于人对于真、善、美即知识、理性、感情执着的追求。文化，包括物化了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既是这种不断努力与追求的结果，又是这种努力与追求的方法、目标。这种目标的追求和努力的方式，也就是人们常常说及的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和行为样式。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生活条件，使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及行为样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使得人们努力追求的成果分别显示出各自的特色，由此便区别了文化发展中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深入考察一下，便可发现，它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一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文化，一种自然经济型的文化。无论是儒、道、佛，还是墨、名、法，或者是阴阳、五行、纵横、谶纬，凡是能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生下根、经受住岁月流逝的洗炼者，凡是能在大多数社会成员身上产生影响并逐步积淀为国民性一部分者，无一不是最能表达旧式农业小生产的要求、最符合自然经济结构稳定地不断

再生产客观需要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居支配地位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及行为样式，正是在传统的小农型自然经济基础上，以儒家思想观念为主干，融合其他多种学说观念而逐步形成的。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道德、宗教、艺术、法律、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等文化成果，都显示了这一历史特点。

近代化-现代化进程，就其归趋而言，是要逐步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变自然经济体系为商品-市场经济体系，变乡村文明为城市文明。可是，中国这一历史性的巨大转变，却不是中国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体系发展演变的结果。商品-市场经济体系最初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借助炮舰与种种不平等条约骤然强加给中国的。列强将鸦片和其他商品向中国倾销，随后又向中国输出资本，从中国输入原料、产品及劳动力，始终具有很强的掠夺性质。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是这种不平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商品-市场经济体系的直接受害者。他们非但没有从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中得到利益，反而在所承受的旧的压迫与剥削之外，又加上了新的压迫与剥削。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处在自然经济体系与商品-市场经济体系、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异乎寻常尖锐的对峙中。

在西方，先有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才有产业革命；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又都和血腥的海外扩张、殖民掠夺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大大减轻了自然经济体系的瓦解给农民带来的压力，使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人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成为得益者。中国则不然，产业革命的开始和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同一时间。中国自身就套着沉重的半殖民地枷锁，当然没有进行海外殖民的任何可能，资本原始积累的全部负担便都落到了仍处在自然经济体系之中的广大农民小生产者身上。至于中国的产业革命，它的开始，完全不是建立在本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第一批使用机器的工厂，是封建统治者在严重

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面前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中国最初产生的资本，是具有浓厚封建性的官僚资本。封建统治者借助于政治权力，将从广大农民身上通过经济的及超经济的掠夺得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经营以扩大统治者自身的军事力量与资产为目标的机器工厂。民族资本长期处于附属的地位。这样的产业革命当然非常脆弱，它不可能给广大农民提供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力，而只会给农民增加负荷与灾难。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的切身利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其实都很不发展，都还处在很低下的水平，可是，在广大农民小生产者那里，它们却造成了非常顽固的逆反效果。广大农民对于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由此进而对于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扩大，对于现代城市的兴起，都抱着极端怀疑与不信任的态度；反转来，这倒使他们对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传统的农业社会及乡村文明分外留恋，增加了传统自身的凝聚力。

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代中国重商主义、实业救国这类呼声非常微弱，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演绎而来的农本主义、鄙视商品经济等思潮却影响甚广。人们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和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防止商品-市场经济对农村自然经济体制的冲击联系在一起；对商品-货币经济及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谴责，为什么又常常和对自然经济体制及农民小生产者平均主义倾向的理想化的颂扬联系在一起。这些特征，可以说，正是殖民主义者的巧取豪夺、官僚资本的超经济盘剥以及资本原始积累全部负荷的重压这三重因素所造成的中国社会自身矛盾连连状态的直观反映。

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曾试图在自然经济与商品货币经济这两种呈对抗状态的观念体系之间，寻找到使两者联系起来的结合点，但往往不免顾此失彼、左右支绌。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他们在思考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问题时，总脱离不了欧洲近代化、现代化的现成模式的羁束。他们不了解，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欧洲资本主义式的商品-市场经济近代化、现代化模式，是欧洲社会的产物，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也不可能走上同西方一样的道路，近代殖民掠夺、官僚资本及原始积累的特殊重负，愈加堵塞了资本主义式的近代化、现代化道路。要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商品-市场经济体系，它不是工业压迫农业，城市控制乡村，而是工业帮助农业，城市帮助农村，使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小生产者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像其他新兴社会力量一样，成为真正的得益者。

应当指出，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主要经济命脉，就完全有了可能通过工农联盟关系发展我国的现代工业与现代农业，通过新型的商品-市场经济体制改变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传统的并在近代强化了了的反对商品-市场经济以及将自然经济理想化的倾向，在现代中国仍然保持着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使我们面对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农村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战战兢兢，摇摆不定，甚至一再将这种发展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等同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灾难而大加挾伐。也正是这种影响，使我们常常幻想在自然经济与小生产的基础上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制度，结果，平均主义思想泛滥，导致对农民的剥夺。所有这些，都使我国现代化进程遇到了本可避免的损失与曲折，也使得我国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及行为样式的变革，常常把握不住准确的方向。

我们以为，在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这应当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危机与生机——传统整合意识的近代命运

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常以“整合意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他们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讲的是人与自然的整合，大一统讲的是人与人的整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讲的是人的内在修养与社会活动的整合，这种整合意识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内聚力量特别强大的稳定结构或超稳定结构。

其实，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根植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单一性，根植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因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小生产者长期生息在一片极为窄小的土地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之间没有频繁的经济联系，除了生产上、生活上的单一化之外，除了在严重的天灾人祸威胁面前他们将不约而同奋起为保障自己原有小天地进行斗争外，平时确实如一片散沙。他们将自己所不识不知的一切都归之于高高在上的权威，从天上的神佛到人间的君王、官吏，希望由他们来代表自己、保护自己。像一盘散沙一样的无数单个小农和他们所敬畏的权威，依靠三条主要的纽带连接起来：一是由自上而下运用行政权力来支配社会的官僚制度构成的政治纽带；二是由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宗法制度构成的社会纽带；三是由以圣化了的经典对广大“愚民”的绝对统治为终极目标的文化专制制度构成的思想纽带。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是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需要鸟一样自由的无产者，资产者本人当然需要同样的自由，这就必须冲破中世纪的整合体

制、整合意识。在机器大生产中,在现代商品-市场经济体制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整体关系,这种整体关系不是若干孤立的个体消极的因处于同一地位而形成的整合,而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各个个体积极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在联合。这种新的整体意识与传统的整合意识必然处于对立的状态。在近代中国,随着近代化、现代化进程渐次展开,传统的整合意识便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挑战是以造就近代化的个人与近代化的社会整体为中心,从争取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出发,政治上形成近代民主意识而要求推翻君主专制下的官僚制度,社会关系上形成近代平等意识而要求冲破封建宗法制度的羁束,思想文化上形成主张思想、言论、创作、学术自由的自由意识而要求打破思想文化专制制度。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到孙中山、章太炎,从陈独秀、鲁迅、胡适到中国共产党人,许多自觉追求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志士仁人,在这场挑战中都不避锋芒,勇猛地呐喊冲锋。

传统的整合意识所面临的是一场真正的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对于传统的整合意识并未构成致命的威胁。因为近代化、现代化所孕育的新意识基本上还只局限于少数接受了较多近代教育与近代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和其他下层民众,差不多都仍然处在传统的整合意识的宰制之下,整合意识据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仍然相当坚固。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特殊环境与曲折道路,还出乎意料地反过来给传统的整合意识带来了新的生机,使它在危机与挑战面前很快就又重新站住了脚跟。

给传统的整合意识带来新的生机的第一个因素,是近代深重的民族苦难激起了我国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空前高涨。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为了使中华民族发展成为近代型民族,在建立近代民族语言、民族经济(统一的国内市场)、民族文化方面,作了

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为了使中国建成一个近代国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流血与不流血的斗争。但是，并不是所有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都是近代型的。和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及笼统的排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意识及国家意识，便是传统的整合意识在民族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典型表现，它们在近代中国反对列强的斗争中却往往起了吸引和动员下层民众的作用。反对列强侵略、抵抗列强瓜分中国的野蛮行径的斗争所具有的正义性，冲淡了传统民族意识与传统国家意识的落后性。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和一个浪潮紧接着一个浪潮的反帝斗争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近代型的和传统型的两种不同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既互相牴牾，在反帝斗争中又经常站在同一营垒，这一状况不能不助长传统的整合意识对于个性解放及现代民主、自由意识的压抑力量。

给传统的整合意识带来新的生机的第二个因素，是近代中国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的日益扩展。中国农民，在近代基本上都还继续保持着原来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直到1949年，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经济生活和古代都还差不多。然而，正是这些农民，在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了队伍最为浩大的主力军。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这样震撼中国大地与世界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斗争；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各地方此伏彼起的反洋教斗争、会党起义、饥民暴动，实际上也是农民的斗争。在这些农民运动中，带有浓厚的家长制、家族宗法制的旧式结社形式，在将分散的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这一点上，继续显示了它们的活力；而传统的权威主义、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现象，在这些大大小小、集中或分散的农民斗争中，更是一如既往地将它们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实质上也是一场农民战争。由于有了新的社会阶级力量的领导，现代人民军队、人民政权的建设都采取了新的形式；然而，作为一场农民战争，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农民中根深蒂固

的权威主义、行政权力的支配作用、宗法观念等等，並沒有就此完全失去它们的影响。这些在经济生活上还停留在过去的农民，最为关心的直接斗争目标是平均分配土地，他们将领导着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无产阶级领袖习惯地看作“大救星”。广大贫苦农民，由于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环境及所受的教育限制，在触及近代自由时，常常很快便使之变成小生产者散漫无纪的无政府状态，在触及近代民主时，常常很快便使之变成极端民主化。使经常处于一片散沙状态的农民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领袖的权威，政治上的和精神上的权力支配便都是不可缺少的。这些历史的机缘，必然反转来有助于强化传统的整合意识在近代平等意识与自由、民主意识面前的抗冲能力。

给传统的整合意识带来新的生机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中国近代新意识自身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严重弱点。中国近代自由、平等、民主等意识，主要渊源于欧、美、日本等西方国家和苏联。中国近代型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在如饥似渴地虔诚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中间的中坚力量，基本上都是先后从日本、美国、法国、苏联及其他西方国家归来的留学生。他们通过译成中文的一些不多的西方著作中，或者在国外直接阅读的西学著述中，接触到西方近代意识，并忙不迭地将这种意识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他们没有经历过从中国传统意识自身的矛盾出发，对传统意识较长时间的自我清理、自我扬弃。他们想走捷径，结果，由于自我批判的主体精神不足，反而常常运用传统的经、传、注、疏式的教条主义方法去对待西学。西方化的形式，教条化的方法，必然带来反效果，让传统意识得以用民族意识、国粹主义、中国特殊国情等身份来对抗近代意识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已经暴露得相当清楚，西方已经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批判资

本主义的思潮，除了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外，还有大量反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将所有这些不同的思潮都当作最新的意识形态发展成果一股脑儿地搬到了中国。那些对近代化、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本来就极度反感的传统思想维护者，对于那些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及许多非科学的社会意识当然欢迎之不暇。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与传统的文化结构，在这里也就为自己的继续存在找到了外在的依据。

在历史的发展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极相逢，并不一定马上就你吃掉我，或者我吃掉你，而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中，相反者相成，彼此为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整合意识的关系，便是如此。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不发展。新的意识力量过于脆弱，不足以击破旧的意识盘根错节的统治地位；旧的意识也正是利用了新意识的幼稚与弱小，才能在新的历史运动中继续起作用。近代以来，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民主与科学为两面大旗的新思潮一次又一次地向传统意识冲击，而传统意识依旧甚至在一些方面还变本加厉，原因即在这里。如果离开了这一特定的环境，夸大传统意识特别是整合意识在我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甚至以为这种作用具有普遍性意义，由此而作出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已经有了相当的现代化的基础，已经有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广泛的世界联系，比之近代，我们已经成熟得多，完全有可能采取更加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方法、步骤来推进我国全面的现代化建设。可是，我们的思想认识没有及时地转变，以为当年行之很有成效的那些组织旧式农民、领导农民战争夺取政权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现成地用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

设。在完成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建立统一的国营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农村普遍实行合作化、公社化，在城市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改造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和强化了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权威主义所发挥的显著作用，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意识。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小生产者充斥的国家，不借助于行政权力对于社会的支配作用，不借助于高度发展的权威主义，是不现实的幻想。但是，在此同时，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这个作用的另一侧面。特别是当我们对小生产者意识负面注意不够的时候，因害怕资本主义的侵蚀，运用政治权力和权威主义来遏止经济对外开放与交往，因害怕资本主义的复辟，运用政治权力和权威主义来压制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因害怕资本主义思想的自由泛滥，运用政治权力和权威主义来干预思想、言论、新闻、创作、学术的自由发展，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何等损害，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传统的整合意识及其维系这一意识的三大纽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是一把双刃的剑，在这30多年来的实践中也可以看得相当清楚了。

定于一尊与多系发展——百年来文化论争的再思考

关于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至少已经争论了100年，并在清朝末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30年代初以及近几年来形成三个高潮。国粹主义与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中西分途与中西调和，清末已经出现的这些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思潮与派别，尽管在时代变革中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不小变化，至今仍然各执一端，相持不下。

一个世纪来的文化论争，决非一群书生的空泛议论，因为所有各派文化论，都同经济的、政治的及社会的实践不同程度地直

接联系着。今天，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对所有这些文化论重新检讨一下，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同传统文化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近百年来坚持传统的礼教不变，原封不动地固守自然经济观念、宗法伦理观念及大一统观念的人，数量是在急速地减少，他们的影响也明显地缩小了。从清王朝到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直到蒋介石政权，他们或明令尊孔读经，或企图重建纲常名教，但是，他们的行动实践，却大体遵循着“中体西用”路线。他们想在保持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及行动样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从西方移植一部分现代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他们不了解，物质生产方式才是真正的本体，它一旦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及行动样式就不可能继续保持不变。但是，他们运用政治权力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等等，确实增加了现代化生产方式及相应的各项制度、文化形态建立的困难与曲折。

同样，这100多年来直截了当地宣传“全盘西化”的人也是少数，而且比传统礼教的维护者还要少得多。全盘西化论者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历史的创造，是不可能凭空进行的。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本身就是先前历史创造出来的，在他们身上，不可能不保留有大量先前社会文化的基因。而当这些创造者进行历史的创造时，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力、资金、社会交往关系及各种精神材料，又无不是先前全部历史发展的积累与遗存。人们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新的创造，但是，这些材料本身同时也规定了人们创造历史的方式、限度。全盘西化论者不了解西方现代文明毕竟只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社会历史不同于西方，更不是一张白纸，想将西方现代文化现成地搬到中国来，既脱离了中国的历史与实际，也脱离了西方的历史与实际。

比之“全盘西化”的影响大得多的，是各种与“中体西用”

针锋相对的“西体中用”说。近代以来，思想家、改革家们最初是从形式上，然后又从内容上，逐步接触到了近代化、现代化如何体现中国的特殊环境、特殊条件这一问题。康有为可以说是这样做的第一个人。他从初期中译西书中接受了西方的价值取向、行为样式，为了使同时代其他人比较容易地接受这些东西，他找到了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作为这些东西的表现形式，走了一条“托古改制”的道路。其后，章太炎从先秦诸子和佛学典籍中，给他的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涂上了浓厚的古典色彩；孙中山在早年并没有给中国传统文化多少注意，在晚年，则有意识地将儒家仁爱说教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内圣外王”之道理想化，将他自己的政治学说宣布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真传。他们都是真诚的改革者，在致力于改革时，也都已注意到了中国区别于欧洲的特殊性。但是，他们的改革目标，基本上没有跳出欧洲现代化模式的窠臼。他们原先是想将这一模式适当加以变形，使它取得一种“国粹”的形式与身份。结果，却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成功。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体，就很难不使中国削足适履；为使这一模式“国粹”化而精心构造传统的脉络，放松了对习惯势力的警惕，反过来倒可能为传统的力量所压倒。他们的改革事业终于流产，与此不能不说有内在的联系。

站在这两大流派中间的各种中西文化调和论，理论上是想对“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进行折衷，实践中其实总是不依附于这一个方面，便追随那一个营垒，没有形成值得重视的足够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方特别是从苏联学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从中国既有了新的生产方式，旧式农民仍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实际出发，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

大山，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文化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视为封建文化，将西方近代、现代文化主要视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化，采取了相当严峻的批判态度。在以夺取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战争年代，文化问题整个说来不是很突出；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决定性意义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而我们基本上仍然沿袭了过去的态度，矛盾就逐渐激化了。因为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可能离开中国和世界原有的文化基础凭空建设；要建设，就必须了解、吸收、利用、改造传统文化与近代现代世界文化，逐步形成新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行动样式和新的文化结构；可是，这却被不少人视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自由泛滥。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六亿人民都做批判家，要和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全部旧思想、旧文化彻底决裂。结果，造成文化上一场浩劫。彻底决裂，反而使人们倒退到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对领袖的画像、名字顶礼膜拜的文化蒙昧主义，倒退到原始的图腾崇拜，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异常严重的损害。

返观我国文化论争的近百年历史，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事实，这就是：一方面，由于积习太深，几乎所有各派都不免受传统文化“定于一尊”倾向的影响，总想变现代化进程为确定自己一派思想文化独尊地位的过程；而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本身却正利用着文化的多系发展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曲折与反复之中开辟着符合中国实际的自己的道路。

考究一下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上述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它实际上相当普遍，而其归趋则是文化的多系发展。追究其原因，首先，现代化是整个社会全方位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过程，只有通过多侧面、多层次的认识活动，人们方才能够超越单一化认识的局限性，掌握现代化进程的纷繁复杂的内